

思想与社会条件：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



韩启云*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五四白话文运动被称为五四“最富活力的遗产”，这一官宣“白话”取代“文言”立为社会通用语言的运动，总结了传统与现代的纠葛所在，向来备受关注。这一语言革故鼎新的文白转型，并不单纯是语言问题，既牢牢地镌刻着社会文化的烙印，又是时代聚变的缩影，为透视 20 世纪上半叶甚至整个 20 世纪社会的新旧交替提供了一方窗口。省察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发展与影响，有助于揭示白话文运动真实社会影响面相，对全面认识理解“五四”有所裨益。阅读是一种社会现象，透过阅读现象关照“五四”，探讨白话文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路径。白话文运动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其动势承续自晚清时期关于提倡白话文的思想主张与实践。晚清白话文运动不仅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在白话观念普及、白话文实践应用等方面做了积蓄准备，在受众群体与传播环境营造方面的准备更是尤为可贵。同时，大众传播媒介的兴盛与可观的阅读群体，又构成了白话文生发的社会历史条件，刺激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展成型。五四白话文运动确立了白话文的使用，其影响延续至今并仍在持续，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 五四白话文运动; 晚清白话文运动; 社会历史条件

DOI: [10.57237/j.ssrf.2022.01.003](https://doi.org/10.57237/j.ssrf.2022.01.003)

Thoughts and Social Conditions: The Occurrence of the May Fourth Vernacular Movement

Qiyun Ha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May Fourth Vernacular Movement has been called "the most dynamic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hich officially declared "vernacular" to replace "literary" as the common language of society. It has always been a matter of great concern. This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nguage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is not simply a linguistic issue, but is firmly engraved with the brand of societ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a microcosm of the changing times, providing a window into the social transi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r even the entire twentieth century. An examination of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f the vernacular literary movement can help reveal the true social impact of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and contribute to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y Fourth. Reading is a social phenomenon, and looking a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rough the phenomenon of reading and exploring the socio-historic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took place provides us with a path to touch history and en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originated

*通信作者: 韩启云, han@njnu.edu.cn

in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its momentum continued from the propositions and practic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not on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ay Fourth vernacular movement in popularizing vernacular concepts, experimenting with styles, and creating vernacular creations, but also in preparing for the creation of audience groups an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sperity of mass media an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reading groups constituted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ernacular writing and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y Fourth vernacular movement. This movement established the use of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and its influence continues today and is still ongo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society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Keywords: The May Fourth Vernacular Movement; The Late Qing Vernacular Moveme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1 引言

谈及“五四”，作为一个“不断重临的起点”，任一与其相涉的课题都有细加推敲的必要，其自身也表现出“常受特别关注，研究取向经常变换，总与时代热点话题关联”[1]的强烈现实性。白话文运动作为五四“最富活力的遗产”，这一官宣“白话”取代“文言”立为社会通用语言的运动，绾结了传统与现代的纠葛所在，向来备受关注。以往研究关注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之间存在因承关系。[1-4]这一语言革故鼎新的文白转型，并不单纯是语言问题，既牢牢地镌刻着社会文化的烙印，又是时代聚变的缩影，为透视 20 世纪上半叶甚至整个 20 世纪社会的新旧交替提供了一方窗口。省察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发展与影响，有助于揭示白话文运动真实社会影响面相，对全面认识理解“五四”有所裨益。阅读是一种社会现象，透过阅读现象关照“五四”，探讨白话文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路径。本文以阅读现象关照“五四”，探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2 有意提倡白话文：清末民初的社会启蒙

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话题之一。1917 年 1 月，胡适在《新青年》2 卷 5 号上刊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率先发难。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方针，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

字俗语”，反对旧文学言文分离现象，明确主张用口语作诗文，替代久居正统地位的文言文，进而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白话文运动从 1917 年提出，1919 年几已成定局，仅用了三四年的时间，便得到官方的认可推行。这场白话文运动的“速成”，是诸多新文化人所始料未及。包括胡适本人也深感意外，他在其口述，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谈到，新文化运动在谋划之初，预计要用 25 到 30 年的时间，这场运动成熟之快，出乎他的意料。[5]

白话文运动虽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并不是“五四”的专利，其动势由来已久，早在晚清时期改良派便提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主张。通常意义上，常又有晚清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别。上世纪末以来，“被压抑的晚清”逐渐被“发现”，兼及“五四”与“晚清”的学术视野成为风尚。这一学术背景下，长期被低估的清末社会逐渐被重新认识。

考察晚清社会，有意提倡白话文的思想由来已久，白话文在清末社会启蒙中发挥了极大的效用。纵览泰西各国、睹察日本国情的黄遵宪，在 19 世纪末便提出了，要变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主张。事实上，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脱胎于对传统八股文的反动。1895 年，康有为在呈奏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就提出了废八股、改科举的主张：“臣窃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直言传统八股文僵化自闭，“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人。汉祖、唐宗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结舌，不知何

语矣”。甚言之，中国近代屡败赔款，都碍于八股文所致。戊戌维新期间，迫于改良派的压力，光绪帝曾两次下诏，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百日维新”期间，裘廷梁《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分外夺目。文章中裘廷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

清末民初社会，提倡白话文不仅是思想主张更是一种实践。尤其是在文教领域，更是提倡白话文的先行军。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使习通行之官话，期于全国语言统一，民志因之团结”。民初，蔡元培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总长，对传统教育做了较大改革。1912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废止“讲经读经”科。同时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改各类学校“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等科目，统一定名为“国文”科。文教领域的诸多改革举措切实推动了白话文的应用普及。

清末社会广泛存在的白话报、阅报社、宣讲、演说、戏曲等“开民智”的主要载体形式，为社会下层启蒙运动的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社会启蒙运动虽未能短期内取得“丰硕可观的成果”，但“这个运动并非及身而止，在十年内就倏然消亡；而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走向民众’运动的起点和第一波”。[6]清末民初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虽然并未旗帜鲜明的打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口号，但有意提倡白话文的思想与实践，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发展开拓了基础。

3 读者及其环境：联结晚清与五四

清末民初，庞大的读者群体及阅读接受的环境，是促使五四白话文运动发生的关键因素，同时，读者及其阅读接受环境亦成为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力保障。

首先，这一时期科举制倒台带来的社会冲击，使得传统八股文失去了对社会上升渠道的垄断，一定程度上为文体变革清除了障碍。亦为五四白话文运动预备了庞大的读者群体，是白话文运动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潜流生发出地表的前提条件。古代中国，“士”在四民社会中居首，在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厉行科举制的传统中国，读书做官，经邦济世，是士人至高的理想道德。“学而优则仕”是士人考取功名和社会晋升的正统管道，读书人从“修身”起，进而“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步入20世纪，科举停废之举，使得新

式学堂学位一夜之间取代科考功名，成为社会公职的基本准入资格，传统士大夫历史性的转便为“现代知识人”。作为“举国知识菁英与国家功令及传统价值体系”之间“大动脉”的科举制度，被“切断”，“从此两者变得毫不相干，国家与知识大众成为两个不相系联的陆块，各自漂浮”，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自由流动资源”（free floating resources）。[7]这一“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仿若游离无根，在政治上，这类知识分子是边缘人，但在文化上，他们的影响却不容小觑，属于文化精英阶层。显然，科举制倒台为白话文的广泛传播预备了受众群体。后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弄潮儿”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抒发过这样的观感“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8]。

其次，清末下层社会启蒙场域的成熟发展，尤其是“公共领域”、“印刷资本主义”等方面势如破竹的发展，提供白话文（包括观念和作品）传播发展的受众环境，是白话文运动蓄势的沃壤。哈贝马斯称“报刊”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9]，清末社会纸质传媒的繁荣是毋庸置疑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897年到1918年所出报刊达170种之多。显然，报刊的大量涌现为公众“舆论空间”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早在上个世纪70到90年代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中，报刊宣传便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此外，在物质力量层面，安德森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在白话观念散布、流传过程起到的助推作用[10]。1912年梁启超在《庸言》杂志创刊号上，对比时下报馆的繁盛慨叹自己18年前《中外日报》“沿门乞阅”时代“殆如隔世”。随及，梁在《与嫀儿书》（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谈到销量时“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订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两万份”[11]，以此可推断民国初年出版印刷界的发达，而这一现象正是承续自清末社会的技术积累。“符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被传播技术所决定，文言文与雕版印刷术相适应，白话文与机械活字印刷术相适应。雕版印刷术的有限的传播能力和技术支持了文言文占据数千年的正统地位，而晚清以来机械活字印刷术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它要求有广泛的读者、频繁更新的内容、广阔的市场与之相适应，借助白话文运动这样一种剧烈的、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机械活字印刷术获得了大批量生产所必需的读者群和市场，并取代了雕版印刷术的主导地位”[12]，现代印刷技术加速了白话文传播的广度和效度，白话文满足了印刷资本对市场、读者的需求。显然，白话文与“印刷资本主义”

的结盟，是双向互生共赢的关系。经历了晚清现代公共空间与印刷技术的发展，行至民初，白话文发展传播迎来了质和量的突破。

如果没有晚清以来受众及接受环境的历史准备，白话文运动能否短时间突破故纸书堆的禁锢是值得商榷的。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涌现出了 400 多种白话报刊，介由白话文传播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蓄势骤发，迎来了思想文化的繁荣。

4 报章媒介营造的“思想版图”

白话文运动之所以“运动”起来，大众传播媒介的兴盛与拥有阅读能力的群体，两因素缺一不可。这两个因素决定了白话文阅读的深度和广度，更规界了后人回溯五四的广度和宽度。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整个新文化运动都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而这正是“白话文运动”走向昌炽的话语背景。晚清时期，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诸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白话报刊。戈公振（1895—1935）在其《中国报学史》就谈到民初的社会现象，“人民阅报纸习惯业已养成，凡具文字之知识者，几无不阅报。偶有谈论，辄为报纸上之纪载，盖人民渐知个人以外，尚有其他事物足以注意”[13]。据周策纵统计 1917 到 1921 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 1000 种以上，可见当时纸质传播媒体的流行。这一点，也可以从施存统（1898—1970）的回忆得到佐证。据施存统回忆，五四运动发生时，他正就读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他与周围同学组织了“书报贩卖部”每天都贩卖各种进步书刊。据他们的贩卖反馈显示“传播新思潮的刊物有十几种之多，销行最广的是《新青年》杂志和《星期评论》周刊。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有学生四百人左右，有一个时期，校内就销行《新青年》和《星期评论》四百几十份”[14]。以此推算，特定时期，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几乎达到人手一份的阅读规模，可见当时之盛行。同样，也可以从当时的报道得到印证，1923 年《时事新报》刊登的一篇讨论思想界潮流的文章提到“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出版事业之繁荣勾勒了白话文传播的“思想版图”，为白话文推展准备了传播条件。

白话文运动之所以“运动”起来，关键因素在于受众，即拥有阅读能力的群体。由报刊传递的印刷符号、语

言文字、智识科学，须有相应的文化素养才能准确还原、识读。“就思想启蒙运动而言，五四与近代相比，只有广狭、深浅、彻底不彻底之别。白话文作为启蒙的手段，自有其优长处，晚清的白话文也因此拥有广大的读者。这些接受了启蒙教育、具有一定觉悟的读者群，就是五四白话文学迅速获得成功的群众基础”[15]。20 世纪以来科举废停为“白话文运动”储备了阅读受众。就像罗志田所指出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城镇区域，形成时代的‘潢潦’，有一个思想以外的根本社会原因，即大批知识青年的追随”[16]，质言之，五四青年的在场是白话文能够“一日千里”的前提条件。16 岁便到上海习商的莫芙卿在《新青年》2 卷 3 号（1916 年 11 月）的来信中称“日则以新闻纸为吾良友，夜则风雨不辍，沿习英文，迄今忽忽十年，自问学问虽无门径，而对于吾个人自立之基础已稍稍成功”[17]。周策纵将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来的“知识分子集体”，称为“新知识分子阶层”，指代“那些或多或少受过教育的人，教师、学者、大中学生、新的士绅阶层及其他专业人员，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律师”。[18]从阅读角度审视，这一群体便是开展白话文阅读的中坚力量，在诸多五四青年日记回忆中，都能看到这一时期人们的阅读实况。据毛泽东回忆，他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元钱”，其中就有三分之一用在订报纸上“我父亲骂我大手大脚，说我把钱浪费在那些废纸上。但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 1911 年到 1927 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没停止过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等地的报纸”[19]。无独有偶，据时就读北京大学的何思源回忆，1918 年红楼刚刚建成那会，每逢《北京大学日刊》出版时，北大红楼前人满为患，“争相购买，有的人购买几十份，以至于上百份，霎时间几千张报纸就被抢购一空，后来者只好向隅”[20]。

5 结论

追索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五四”与晚清不可谓不一脉相承。晚清以降的思想启蒙运动、有意提倡白话文的思想打破了日显僵化的八股文桎梏，白话文的普及应用逐渐得到广泛认可，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奠定了思想基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西学东渐与民族危亡的双重压力，这一背景下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社会通行语言，关涉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想、社会转型的方方面面。从阅读现象关照这一运动，

读者及其接受环境为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庞大的读者群体及繁荣的阅读接受环境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能够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

参考文献

- [1] 朱志敏. 八十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 [J]. 中共党史研究, 2006 (02): 37-46.
- [2] 胡全章, 关爱和. 晚清与“五四”: 从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09): 159-175.
- [3] 高玉. 晚清白话文与五四白话文的本质区别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9, 39 (05): 52-62.
- [4] 徐佳贵. 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地方化——以无锡教育界为视域 [J]. 近代史研究, 2021 (04): 136-150.
- [5] 欧阳哲生编. 胡适文集(1)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33.
- [6] 李孝悌.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 1901-1911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40-242.
- [7] 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244.
- [8] 欧阳哲生编. 胡适文集(3)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52.
- [9] [美]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曹卫东,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218.
- [10] [美]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 [M]. 吴叡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32-33.
- [11] 丁文江、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661.
- [12] 汤文辉, 黄斌. 印刷术与文、白之争——白话文运动的媒介学分析 [J]. 浙江学刊, 2007 (04): 89-93.
- [13]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237.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 五四运动回忆录(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754.
- [15] 夏晓虹. 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5 (03): 22-41.
- [16] 罗志田. 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235.
- [17] 莫芙卿: 《致陈独秀》, 《新青年》2卷3号, 1916年11月1日.
- [18] [美]周策纵. 五四运动: 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M]. 周子平等,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10.
- [19] [美]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 [M]. 李方淮等, 译.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111.
- [20]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编. 五四运动亲历记 [M].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99: 56.